

毛泽东的思想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 著
刘李胜 陈建涛 编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京)新登字 100 号

责任编辑 王春华
封面设计 王 岐
责任设计 冯 力
责任校对 吴白桦

毛 泽 东 的 思 想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 著

刘李胜 陈建涛 编译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 9.875 印张 220 千字
1992 年 4 月第 1 版 199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ISBN7—5035—0523—0/A·23

定价 4.50 元

(内部发行)

译 者 的 话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从事革命事业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思想财富。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这些年来，在我国国内学习、研究、运用毛泽东思想不断取得新成果、新成就的情况下，国外也有许多学者根据各自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研究。在诸多的研究成果中，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所著《毛泽东的思想》一书，尤为值得重视。为了帮助国内有关读者了解西方学者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状况，我们翻译了施拉姆教授的这部著作。

施拉姆教授长期从事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研究，从60年代以来，相继发表了许多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和论文，尤其是他所著的《毛泽东》一书，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部《毛泽东的思想》，可以视作《毛泽东》的姊妹篇。

施拉姆教授在该书中，对毛泽东的思想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的重要地位进行了评价。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所作的最具有持久和普遍意义的贡献，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科学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他特别明确地提出：毛泽东毕生奋斗的理论目标，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实践经验，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

思想的功能目标，是致力于把马列主义运用到落后的农业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现实之中，运用到中国的历史遗产之中，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他还指出，在毛泽东逝世后，毛泽东的思想中某些被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得到了限制和抛弃，但毛泽东的整体思想和其功能的影响还是如此深远和广泛地确实实地存在着的，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具有经久不衰的意义。

施拉姆教授在该书中，着重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发展轨迹和内在逻辑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毛泽东的思想的发展轨迹和内在逻辑是统一的。他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具有很强的连贯性，但这决不意味着毛泽东的思想及其功能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运用的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的。他要求把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的实质和它所引起的意义深远的变革，“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施拉姆教授在充分肯定毛泽东的思想的科学性和完整性的同时，也根据他自己的认识指出了其中存在着的某些矛盾和断裂现象，认为这主要表现在关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转折，导致他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道路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重大失误上。然而，他明确地认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恰恰是对毛泽东的一贯思想的背离，恰恰是由于毛泽东出于主、客观多种原因而抛弃了自己的正确思想才造成的。他批评了国外一些人所持有的一种观点，即认为中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毛泽东的思想所作的重新评价是“非毛化”，他认为中国现在所做的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他认为，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中继续得到了贯彻。

施拉姆教授认为，毛泽东的思想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这是毛泽东一生探索“中国式”的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表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同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其他哲学思想是相联系着的，它表明：为了寻找一条现代化的道路而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保留中国的特色；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同时又要适应中国的具体情况，适应中国人民的文化传统。他还提到，“中国化”概念还是一种象征，它最直率、最大胆地体现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以及中国人需要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的坚定信念。

施拉姆教授在该书中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也有其自己的特色，主要表现在：（1）作者力求把毛泽东的思想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把毛泽东的思想的发展视为一个由多种因素合力作用促成的趋向，从多个侧面进行分析，这就使观察问题的视野更加开阔。（2）作者力求把历史描述、理论分析和文献史料考证密切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广泛地占有资料。他注重对毛泽东本人的著述、文献和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辨析考证工作，同时还注重对国内外的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评析工作。他力求把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尽可能建立在客观事实和可靠资料的基础之上。

然而，施拉姆教授作为一个西方学者，难免要沿袭西方思想界由来已久的某些观念、偏见和惯常的价值标准，来看待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某些历史事件和重大问题，来看待毛泽东及其思想。显然，他在本书中所做出的某些判断是不全面、不公允的，甚至是十分错误的。例如：他以“人性的胜利”或“人性的破坏”来说明和评价一些历史事件，并把毛

泽东的“天性”当作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根源之一；他以资产阶级的民主观、自由观来评价我国所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就难免表现出将民主和集中、自由和集中割裂开来的倾向；他也没有彻底摆脱国外比较流行的一种偏见，即没有把在特定历史条件所产生的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个人崇拜同什么秦始皇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希特勒的资产阶级法西斯主义从本质上严格加以区别，而是以抽象的推论，硬把毛泽东说成是“仁慈的独裁者”、“部分是君主，部分是革命领袖”、“红色的法西斯主义”等等；他同国内外的有些学者一样，也断定毛泽东有“浓厚的农民意识”，并用权力之争和个人恩怨来解释毛泽东的一些思想和行动；他把马克思主义只看做“西方文化”，断定毛泽东思想是作为“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的结合，并以这“两个基本构成因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彼此消长的过程当作论证毛泽东晚年为什么犯错误的重要依据，而牵强附会地从道家的“阴阳”辩证法中找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根源，从儒家强调国家教化职能的传统观念中找出夸大上层建筑的作用和主观能动性的思想根源，等等。当然，该书的这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学者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一些情况。但是，我们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客观的历史事实和可靠的文献、资料为根据，对该书中的论据和论点加以鉴别，明确地分清是非。

我们认为，尽管该书中存在着一些错误和偏见，但总的说还是一部严肃的、学术性较强的、有一定特色的专著，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毛泽东思想仍有其参考价值。

1990年12月

目 录

绪言	(1)
导论	(6)
上 篇 毛泽东的思想：从产生到1949年	(25)
第一章 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 (1917—1927年)	(27)
第二章 党、军队和民众 (1927—1937年)	(73)
第三章 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 (1937—1940年)	(105)
第四章 毛泽东的思想的胜利 (1941—1949年)	(137)
小 结 新型的人民民主专政可能吗？	(146)
下 篇 毛泽东的思想：从1949年到1976年	(152)
第五章 从人民民主专政到人民内部矛盾	(155)
第六章 毛泽东对“中国式道路”的探索	(191)
第七章 中苏分裂的原因及后果	(221)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	(253)
小 结 寻找毛泽东的思想遗产	(275)
结 论	(289)

绪 言

本书由两部分组成：“毛泽东的思想从产生到1949年”和“毛泽东的思想从1949年到1976年”。前部分已经发表在《剑桥中国史》第十三卷中，而后部分将及时地刊登在《剑桥中国史》第十五卷中。本书在编辑上做了一些小的改动，但是，由于技术上的限制，要对原文尤其是本书的上篇作随意调整已经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本书中，阐述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很大程度上是对他的各种观点作扼要分析。我尽可能地使这些观点与其形成背景紧密关联，尽管如此，要在原文中广泛地论及那些只有在更大篇幅的著作才能加以概括的历史事实，或许是不相适的，即使就那些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事件来说亦如此。

“导论”和“结论”是专为本书而写的，其目的是弥补疏漏，把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纳入一个更广阔的构架之中。“导论”首先论及毛泽东所力图驾驭的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过程的性质问题，以及使他得以扮演领袖角色的各种因素。接着，“导论”考察了毛泽东一生中各个阶段的关系和他思想上的几个转折点。至于“结论”，其目的不再是概括毛泽东的思想的主要原则，而是评价它在中国的深远意义，并预测它今后在一个有些人声称正在发生“非毛化”过程的社会和制度中的位置。

我不认为本书是足够充分的，也不认为它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作了完全确定的阐述，但它却是以我过去二十五年的研究工作为基础的。本书是否把我的解释推进了一步，需待别人来评定。我从事毛泽东的思想研究已多年，这无论如何意味着，我欠下许多人情，在这里对此表示谢意，是我愉快的使命。

为此，有必要作一回顾。我最早发表的这一领域的专题文章，是翻译并分析毛泽东1917年的《体育之研究》一文。这篇专论曾得到艾特纳·巴尔兹的指教，我在六十年代初有幸参加他在巴黎举办的专题讨论会。以后，我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在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工作一年。这使我有机会初次尝试对毛泽东的思想作全面考察。

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和研究所的帮助，这一点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一书的出版致谢中曾详细作了说明。他们中有三人尤其应当提到。约翰·费尔邦克，当时中心的主任，他既严厉又热诚，主持中心工作人员的各项活动。施瓦茨与我在同一办公室共事一年，在这期间，他给了我非同寻常的启迪，并对我的观点作出了公正评价。英格纳·吴，胡佛研究所东西收藏馆的馆长，她为我最初接触延安时期的资料提供了方便，从而使我有可能依据毛泽东1949年以前的著述文本探索毛泽东的思想历程。

1962年夏，我在胡佛图书馆翻阅《解放日报》时并没有想到，我日后会与它的几位主要编辑于光远、廖盖隆、李锐、温齐泽等人相识。这件事是此后发生的世界政治变化及随之而来的思想变化的象征。到1963年，在资料方面和极有价值的思想交流方面，我就已经不仅得益于欧洲人和美国人，而

且得益于日本的学者和图书馆。七十年代初，由竹内实主持编辑了十卷《毛泽东集》，这极大地增强了日本人在毛泽东的思想研究中的地位。无论如何，许多材料在中国本土之外很难得到，如果不是这套既包含公开版本又收入内部版本的资料自1978年以来，广泛出版，与今天的情形相比，我们关于毛泽东的思想的理解肯定会更显得零碎。80年代初出版的东京版增补本由九卷正文和一卷索引组成，它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出版的内部文集。

我之所以能对毛泽东的一生和思想作一次全新的总体考察，除了查阅文献外，还得益于六次访问。自1980年以来，我曾得到特许六次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1980年6月至7月，1982年4月至5月，1982年9月，1984年3月至4月，1986年3月至4月，我先后五次受邀到马列毛泽东思想研究所访问，1987年12月至1988年1月，我再次受邀到哲学研究所访问。我与中国的许多学者和政界人物交谈了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由于人数太多这里就不再提及。有关事实或理解的特殊细节已在本书的注释中作了某种说明。

特别要表示谢意的是，马列所前任所长于光远（1982年5月离职），1982年5月以前担任副所长的冯兰瑞和廖盖隆，哲学所所长邢贲思。他们及其同事牺牲了许多宝贵时间，与我就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问题进行交谈，对我的观点（包括本书各部分的草稿）作出评论，组织专题研讨会，安排各种会议和提供资料。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龚育之及其同事的多次交谈，也使我受益不少。不用说，这里提到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要对本书所表达的观点负责，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交流，我的理解也许就会更显得肤浅。

谈到这些机会，我自然也要感谢曾资助我访华的一些机构：英国科学院经济与社会研究会，该机构指派我参加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联合交流项目；并提供路费；中国科学院，我在华期间，它给予了慷慨的款待和帮助，国家人类基金会，它赞助我参加1980年夏季的“北美中国革命问题考察团”，这是我接触中国学者的决定性的第一步；东方和非洲研究学会，它也赞助我到日本和美国图书馆作几次短期访问，以继续从事我本书的研究工作。

过去十年间的中国之行是有价值的，在那里，我受到热情接待，并颇有收获。但是，这些不会使我忘记，我在寻找原始资料时不断地得到在中国之外的朋友和同事的鼓励和帮助，日积月累欠下不少人情。

说到资料，尤其要感谢来自两方面的帮助。一方面，竹内实、中村公义以及与《毛泽东集》有关的日本学者给我提供了许多重要文献汇编的复印件，它们有关毛泽东1949年前、后的思想。另一方面，哈佛—燕京研究所最近收集到多册毛泽东的著作内部版本，它允许我查阅，并复制其中的一些关键文本。在这批原始资料中，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关于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未经修改的原稿和毛泽东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后面将看到），对我理解毛泽东在1957年至1958年期间的思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同样的原始资料中翻译成册，并附有解释条目的一书，以“毛主席的秘密讲话”为题，将由哈佛大学出版。在目前的这本书付梓之际，我尚未看到这种对“大跃进”期间毛泽东思想的集体评价。但是，我要再次感谢英格纳·吴，她现在是燕京研究所的馆员，为我提供了把上述重要资料结合到我的分析中的机

会。

对于《剑桥中国史》的编辑们，我也欠下不少人情，因为本书中相当一部分章节最初是为《剑桥中国史》而写的。麦克法夸尔，十四卷和十五卷的责任编辑，他仔细审核了我的有关毛泽东1949年以来的思想的商讨文章，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总编辑约翰·费尔邦克在十三卷中的一章发表之前，写了十页机智、深刻且颇有见地的评论送给我，对本书前半部的形式和内容起了实质性作用。

最后，我想对许多专题讨论会和其他一些会议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的理解就是在这些场合中经受批评的，批评常常是尖锐的，但作为进一步思考的鞭策总是有用的。多年来，在欧洲（从伦敦、爱丁堡阿伯里斯特威斯到巴黎、威尔士和那不勒斯）、亚洲（从德里、北京、长沙和湘潭到东京和京都）和北美许多地方（从伯克莱、斯坦福和圣地亚哥到波士顿和纽约，从温哥华到墨西哥城），我曾多次获得这种机会。其间涉及到的机构和个人不胜枚举。同我交谈的有些人可能会感到遗憾，我似乎没有从同他们的对话中学到本应学到的那么多东西。这种过失当然归咎于我，正如我一般地要为各种错误和欠缺负责一样。

导 论

这是一部论述20世纪在中国发生的革命，以及毛泽东在领导这场革命中所起作用的书。毛泽东是通过各种方式来施加他的影响的，既包括制定决定事件进程的决策，也包括编造以他本人为中心的神话，尤其是他晚年时的神话。无论如何，要就毛泽东为中国革命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作出最普遍、或许是最永久的表述，那么，这种贡献就是毛泽东的思想。在这部书中，我的主要意图是阐明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脉络，同时，也通过这项工作把毛泽东及其时代的其它方面的问题加以说明。

我在最初试图对毛泽东的思想作一总体考察的时候，曾经在另一部书的开头写道：“思想发源于历史，思想也塑造历史^①。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要用它来表达我们正在解决的问题的全部观点，显然，是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了。这样的表述意味着（特别是象我在20年前对它详细阐述的那样），思想就是吸取和利用各种资料把它加以综合，并且系统地表达出来，然后运用它们以实现一定的目标。在实际上，无论是毛泽东的思想的内容，还是毛泽东的思想的功能，都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得到不断发展的，当然，其中的主

①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15页。（1963年第1版以同样的句子作为开头。）

要成分是具有连续性的，它既植根于毛泽东本人的天性，也植根于中国的困境。

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和毛泽东的思想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实质，以及它所引起意义深远的变革的巨大威力，这三者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该书阐述的重点内容。在这篇“导论”中，对于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在其中的作用，也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思考。

至此，我对所使用的“革命”一词，并没有在涵义上赋予我个人的独特的理解。除非是以某种革命理论为基础，否则不可能对它作出精确严谨的定义，而且对已经提出的理论，要再附加更多的解释和范例，也不符合我的本意。就我目前的考虑而言，我所论及的那种意义深远、发展迅速、包含与传统决裂或中断成分在内的改造活动，就足以能够界定“革命”，从而使它与其它形式的变化相区别开来。当然，所有这三个关于革命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又是模糊的，不仅事情变化的速度和范围有一个如何度量的问题，而且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界限也蕴含着一个判断问题，它涉及要确定现实的哪一个方面在决定所正在讨论的问题的本质和性质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无论如何，把这三个特征综合起来，就将足以揭示所正在讨论的问题。

人们能够论及20世纪的中国革命吗？从本世纪开始，甚至从19世纪早期以来，这种持续发展的革命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对于它的先前阶段都是合乎逻辑的和具有必然性的结局吗？或者说，所发生的这些一系列相互独立的革命性的变化，没有必要通过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链条而使其联结起来吗？

考察这些问题，不仅对于区别那些连续性的革命发展阶

段是必要的，而且对于区分各种不同范围、方面的革命也是有用的，诸如政治革命、民族革命、文化革命、社会革命、经济革命、技术革命，等等。毛泽东本人在其一生中，多次论及这样六种革命类型。毛泽东和列宁一样，他把政治看作“生命线”，把夺取革命政权看作实现其他方面变革的关键。同时，在政治革命将被开展而趋向完成的情况下，毛泽东也把民族革命、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作为政治革命的必要补充。

在毛泽东还未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之前，中国就发生了第一次政治革命。在中国，人们通常把它看作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事实确实如此，1911年的这场革命是一次松散的、流产的革命。由于它缺乏由明确而固定政治力量所组织、控制和开展。孙中山、黄兴及其所领导的团体，致力于为推翻封建君主专制而创造条件，但是他们既没有完成1911年10月10日举行的起义，也没有能够成功地控制这次起义的后果。然而，这场革命也彻底打破了皇权思想，从而不仅为进一步实行政治变革开辟了道路，而且也为寻找新的革命形式提供了经验。

无论1911年发生的这种政权变易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而清王朝从19世纪早期就开始的崩溃，现在终于达到了顶点。清朝的衰败，不能简单地看作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影响的结果。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于其内部的，即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初期的人口激增，以及旧的社会秩序再无力压制其他新生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兴起。同时，当外国人对清王朝支持时，他们的表演便为革命的方程式增加了新的成分，其实际作用是在加速这个封建王朝的灭亡。

中国从1840年以来，其民族主义的成分一直在明显地增

加。欧洲列强、美国和日本等外国人先后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渗透,其作用力很快就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它不仅在农民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对外国人的憎恨和畏惧的反应,而且几乎在中国的政治界和知识界的有识之士中间也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革命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把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称为一个“强大的革命”^①和“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②(今天我们应当称之为“民族解放战争”)。总之,它对于一个将采取比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起义更为现代的形式民族革命来说,在当时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

很自然,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之所以促进了1911年的政治革命,这是由于,除了人们对清王朝作为一个异族的满清统治者充满了敌意外,更为主要的原因还是清朝统治者的所作所为表现的极端腐败。因此,按照一种传统的说法,他们是已经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人们在“亡国灭种”——国家破碎、民族灭亡的前途面前所产生的强烈的危机感,引导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从改良阵营转向了革命阵营。

人们对皇权思想的弃绝,促成了中国的政治文化革命,然而其本身又是从19世纪中期以来所发生的文化变迁的结果。最初,西方思想是片断地被引进的,之后便是大量地引

①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5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页。

②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1857年5月20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页。

以上引语可参见卡里埃·德昂科斯和施拉姆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和亚洲》,第119—121、123—124页。

进，在这种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下，中国自身的传统发生了激变和重构，形成了一种唯一能被称为“革命的”新思想潮流，进而引发了五四运动的到来。在这个过程中，民族革命和文化革命是相互促进的。

在继武昌起义之后的那次政治革命中，毛泽东作为革命军的一名士兵，当时所起的作用还是不明显的。在五四时期的文化革命高潮中，民族主义日益具有号召力，并具有多种组织形式。从1915年“二十一条”的签定到1925年的“五卅”运动，以及在1926年至1927年的事变中，毛泽东尽管当时还未成为一个能起决定作用的革命活动家，但他已经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了。在20世纪20年代农村所兴起的以农民武装斗争为形式的社会革命中，毛泽东即使不是这场运动的发动者（这场运动发动者的荣誉属于彭湃），他也是这场运动的最成功的代表人物，而且他也是倡导采取游击战争方式开创农村根据地的最突出的典型。

这样说，是否意味着毛泽东只是一个像许多作者在几十年里一直称谓的“农民革命家”呢？有些人是抱有这种成见的，他们简单地利用毛泽东深知革命者都是天生地蕴藏于农民之中，并且他在农村发动了革命的情况，并把它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根据。而且，更有甚者，他们坚持认为，毛泽东在1927年不仅仅是暂时地放弃了城市，而且是全然抛弃了关于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城市知识分子精英的作用的思想，从而使自己献身于农民所固有的乌托邦的理想。

毛泽东曾经动员农民起来进行革命，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认为毛泽东是盲目地附和农民的理想而不去引导他们，则显然是不正确的。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中，他信奉列宁